中华文史资料文库

第二卷

政治军事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China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943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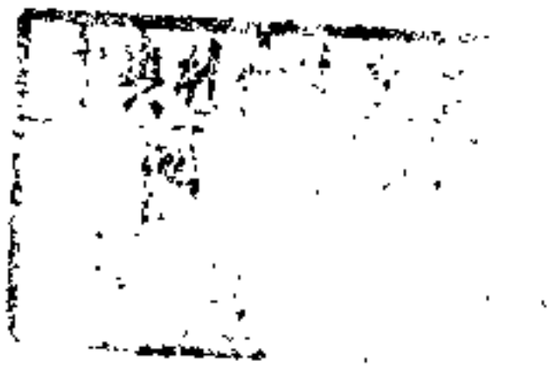
中华文史资料文库

政治军事编

20042052 5

第二卷 （20—2）

五四运动
北伐战争



中 国 文 史 出 版 社
1996·北京

China

目　录

第二卷

（一）五四运动及其他

中国代表拒签巴黎和约的
　经过 …… 顾毓琇（1）
巴黎和会期间我国拒签和约运动的
　见闻 …… 叶景莘（4）
回忆五四运动 …… 许德珩（9）
五四运动和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
　究会 …… 罗章龙(26)
五四运动亲历记 …… 夏明钢(32)
火烧赵家楼的片断回忆 …… 萧　劳(42)
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 …… 顾颉刚(44)
五四运动回忆 …… 何思源(48)
回忆天津五四运动及觉
　悟社 …… 谌小岑(52)
天津五四运动的回忆 …… 孙越崎(65)
上海学生在五四运动中首冲租界
　纪实 …… 朱仲华(68)
参加五四运动的回忆 …… 张廷灏(74)
五四运动中的上海商界 …… 严谔声(76)
回忆五四运动前后在安徽的
　活动 …… 朱蕴山(79)
我在五四运动中的经历 …… 屈　武(83)
五四运动在桂林 …… 李文钊(87)
五四期间福州学生爱国运动暨
　台江事件纪实 …… 林　菁(92)
湖南学界驱张运动前后…… 唐耀章(100)
五四运动后的浙江第一师范
　风潮…… 汪志青(105)
1919年风暴——回忆中东铁路大
　罢工…… 孔繁兴(110)
四川自治运动忆往…… 吴玉章(114)
驱逐沃斯特罗乌莫夫运动…… 张瑞海(116)
六二运动的回顾…… 戴文秀(120)
关于三·一八前后的一点
　回忆…… 刘　隽(126)
三·一八惨案亲历记…… 张舜英(128)
三·一八惨案中的北大
　学生…… 刘生浚(130)
哈尔滨市政权收回和哈尔滨特别
　市成立始末…… 林斯贤　李述笑(135)
收回会审公廨交涉的经过…… 赵晋卿(143)
福州三·二四反帝学生
　运动…… 黄毓泌(148)
东省铁路护路权的接收与东省特区行政
　长官公署的片断回忆…… 林斯贤(157)

（二）南方革命政权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广东的几起
　几落…… 陈劭先(164)
对《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广东的
　几起几落》的补充与订正 … 黎照寰(171)
记孙中山南下护法后十年间粤
　局之演变…… 罗翼群(172)
旧海军南下护法及北归
　纪略…… 胡文溶　袁方乔(199)
海军南下护法和"夺舰
　事件" …… 严寿华　梁敝麟(209)
护法战役中我入湘作战的

经过…… 冯浦澄(221)
1917 年临洮护法运动
记略…… 郑瑞青(229)
苏俄派第一个代表到漳州…… 陈其尤(231)
对《苏俄派第一个代表到漳州》的
订正…… 潘　荣(233)
孙中山与张作霖联合反直
纪要…… 宁　武(234)
旧桂系在广东最后溃败的
战况…… 黄宗儒(238)
新桂系的崛起…… 黄绍竑(241)
驻粤滇军内部矛盾见闻…… 孙天霖(269)
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
纪略…… 罗翼群(276)
追随孙中山北伐回忆录…… 龚师曾(278)
对《追随孙中山北伐回忆录》的几则
订正…… 任启圣(288)
对《追随孙中山北伐回忆录》的
三点补正…… 黎照寰(289)
从第一次北伐到讨伐南路军阀的
回忆…… 蔡廷锴(290)
孙中山北伐在桂林…… 韩　锋(296)
关于邓铿被刺事件…… 沈太闲(299)
邓铿之死…… 李洁之(304)
有关《邓铿之死》的补述…… 陈　樵(307)
有关《邓铿之死》的订正 …… 广东省
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308)
陈炯明与孙中山的矛盾及
分裂…… 张酥村(309)
陈炯明炮击总统府的前后…… 林廷华(317)
关于《陈炯明炮击总统府的
前后》的订正 …… 张酥村(320)
对《陈炯明炮击总统府的前后》
的补充订正…… 黎照寰(320)
1923 年谭赵战争与湘军
入粤…… 方鼎英(322)
追随中山先生东征北伐…… 刘树亮(328)
滇军入粤讨伐陈炯明始末…… 那博夫(333)
广州商团叛乱始末…… 李朗如等(337)
孙中山广东军政府的第一架军用
飞机…… 盖·帕特里克·艾伯特(346)
孙中山先生北上与冯玉祥…… 鹿钟麟(348)
回忆孙中山先生在天津…… 李宝荣(362)
我在孙中山先生身边的
见闻…… 田　桓(365)

(三)北伐战争

第一次国共合作见闻片断…… 杨逸棠(370)
潮汕地区国共合作的情况…… 刘锦汉(378)
国共合作后国民党在北京的
活动…… 罗方中(383)
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的四川
情况片断…… 李筱亭(389)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
浙江省党部…… 江天一(395)
回忆国民党左派组织的建立及
其进行的斗争…… 周新民(403)
大革命时期统一广东的
斗争…… 宋希濂(408)
回忆莫斯科中山大学…… 于树功(427)
黄埔忆旧…… 张治中(431)
回顾黄埔军校…… 徐向前(434)
我在黄埔军校的见闻…… 文　强(438)
我在黄埔军校学习的回忆…… 蒋超雄(451)
回忆军校生活片断…… 郭一予(460)
我的军校生涯…… 宋瑞珂(468)
投考军校的回忆…… 谢冰莹(476)
黄埔建军…… 覃异之(480)
关于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
等同志的被害…… 宋云彬(488)
军校女兵生活散记…… 吕儒贞(489)
烽火中的武汉中央军事政治
学校…… 汤石僧(496)
西征中的武汉军校女生队…… 胡兰畦(502)
我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育长的
回忆…… 侯连瀛(506)

China

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概述…… 丘懋高(510)
黄埔同学会始末…… 曾扩情(513)
我在蒋介石身边的点滴
　回忆…… 苏文钦(524)
励志社与黄仁霖…… 侯鸣皋(528)
陈诚及其军事集团的兴起和
　没落…… 宋瑞珂(537)
随陈诚十九年所见…… 邱行湘(569)
胡宗南集团的形成及
　覆灭…… 裴昌会等(580)
北伐战争回忆片断…… 李汉魂(599)
大革命洪流中的国民革命军第
　四军…… 黄琪翔(612)
北伐军第六军忆述…… 张　轸(617)
第七军提前入湘北伐…… 尹承纲(628)
关于北伐前后几件事的
　回忆…… 唐生智(630)
回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 刘　兴(636)
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始
　末记…… 张景周　程华亭(646)
从汀泗桥到武昌城…… 李醒民(655)
武昌守城纪实…… 朱明轩(662)
围克武昌概况…… 冯岐吾　刘维黄(665)
北洋军战败于两湖…… 刘少泉(673)
陈铭枢谈第一次国共合作在
　武汉…… 李任夫(676)
大革命时代在武汉的
　汪精卫…… 杨玉清(689)
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第二师参加
　北伐经过…… 阮镇秋(694)
武汉政府亲历记…… 赵春珊(705)
记武汉国民政府的北伐…… 晏勋甫(712)
北伐军在江西大破孙传芳…… 樊崧甫(714)
回忆夏超的独立…… 杜　伟(726)
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
　东征纪要…… 章　培(729)
国共两党联合发动的两次
　起义…… 宋伟年　许习庸(736)
记北伐军勇将龚宪…… 袁铭鼎(740)
我所知道的龙潭战役…… 周维纲(743)
龙潭战役回忆片断…… 张文鸿(748)
蒋介石 1927 年下野返浙
　点滴…… 章　培(752)
北伐期间逐鹿中原的军事混乱
　局面…… 张　钫(755)
北伐前后的樊钟秀…… 李文定(773)
国民革命第四军在河南各战役的
　回忆…… 林伟俦(778)
冯玉祥五原誓师…… 吴锡祺(787)
1926 年访苏前后的回忆 …… 鹿钟麟(794)
冯玉祥将军五原誓师
　实录…… 冯洪达　余华心(800)
冯玉祥部第二师援陕解围
　经过…… 李悦农(807)
孙传芳与冯玉祥的徐州
　之战…… 王茂亭(812)
冯玉祥国民军与张兆钾等部的
　最后决战…… 孙伯泉(815)
济南五三惨案见闻…… 苏友文(819)
1928 年日军侵占济南的
　回忆…… 贺贵严(825)
白崇禧在北平、唐山活动的
　片断回忆…… 李任仁(832)
晋奉涿州百日攻守战…… 王畅　桂郁(834)
直鲁军溃东覆灭…… 林宪祖等(840)
张作霖与阎、冯、蒋、李战争
　纪略…… 鲁穆庭等(844)
1928 年我代表白崇禧到东北商谈
　纪要…… 何千里(853)

（四）蒋、汪的反革命政变

我所接触的蒋介石…… 季　方(857)
中山舰事件前后…… 包惠僧(861)
中山舰事件内幕…… 马文车(868)
对《中山舰事件内幕》一文的
　订正…… 宋瑞珂(872)

China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蒋介石亲自策动的三·二三反
革命事件始末…… 李亚男　林世良(874)
重庆三·三·惨案事略…… 李筱亭(879)
刘湘与重庆三·三·惨案…… 乔　诚(883)
粉碎AB团及其江西省党部的
四二斗争…… 刘九峰(887)
四·一二事变前后我亲身经历的
回忆…… 黄绍竑(893)
上海四·一二事变目击记…… 慕中岳(900)
四·一二事变点滴…… 周振强(903)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
南宁…… 雷　成(904)
黄埔军校"清党"回忆…… 方鼎英(910)
黄埔五期"清党"的回忆…… 郑庭笈(915)
琼崖地区"清党"经过…… 李洁之(916)
忆四·一二事变国民党反动派
在南宁的屠杀…… 杨赐章(922)
四·一二事变我在南宁狱中的
见闻…… 吕集义(925)
从成立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到
清党…… 秦　纲(928)
朱培德对政工人员的"欢迎
欢送"…… 梅　原(934)
对《朱培德对政工人员的"欢迎
欢送"》一文的订正…… 宋瑞珂(949)
"礼送"出境记…… 赵　济(950)
讨伐夏斗寅、杨森叛乱亲
历记…… 韩　浚(953)
马日事变前后的回忆…… 屈子健(955)
"马日事变"亲历记…… 魏　镇(959)
1928年成都二·一六惨案的前前
后后…… 廖友陶(970)

（一）五四运动及其他

中国代表拒签巴黎和约的经过

顾毓琇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等同盟国的失败告终。1919年1月，战胜国在法国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中国作为协约国之一，也派代表参加。当时由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派外交总长陆征祥为代表团委员长，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组为代表，同时请孙中山先生主持的广州革命政府也派代表。孙中山派王正廷为代表，派我的岳父曹霖生为代表团秘书长。曹霖生是宋庆龄的表舅，1917年毕业于美国西点陆军学校，在广州参加革命政府工作，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在他旧存的资料中，有述及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拒签和约的一些情况，兹略加整理，公之于世。

主持巴黎和会的有一个协约国最高议会，由法国总理克列孟梭任主席，美国总统威尔逊和国务卿兰辛，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外交大臣贝尔福，意大利首相欧兰都和外交大臣沙巴诺，日本首席代表西园寺公望任副主席。1919年1月28日，和会讨论中国和德国的关系时，中国代表团被邀参加，陈述中国政府的主张大致如下：（1）德国放弃1901年由八国联军同中国清政府签订的条约中所得的特权和赔款，以及在天津、汉口德租界和中国其他地方（除胶州外）所有的房屋、码头、营房、炮台、军火、船只、无线电台及其他产业（使署领署不在其内），并将1900年和1901年所夺取的天文仪器一律归还中国。（2）中国非经署名于1901年条约各国的同意，不处分北京使馆界内德国人的产业。（3）德国承认放弃汉口、天津租界，中国允准两处租界辟为各国公用。（4）德国对于中国或任何与国政府，不得因在华德人被幽禁或被遣回及因德人利益于1917年8月14日被没收或被清理之故，而有所要求。（5）德国放弃在广州英租界的产业，让与英国；并放弃上海法租界内德人学校产业，让与中法两国。

关于山东问题，日本首席代表西园寺公望向和会要求继承德国的权利，提出：（1）德国在山东胶州的各项权利、所有权、特别权利，以及各国于1895年3月6日及其他年份与中国签订有关山东的条约中所得的铁路、矿产、海底电线等权利都让与日本。（2）德国在青岛至济南铁路所得的各项权利，连同用矿权、开采权，一并让与日本。（3）青岛至上海及烟台的海底电线，无偿让与日本。（4）德国在胶州的一切动产与不动产，无偿归日本所有。

胶州是中国的胶州，青岛是中国的青岛。清光绪二十四年，德国借口有一德国教士在山东曹州遇害，即派兵占领胶州。旋清政府将胶州租与德国，定期99年。此后德国人在此筑铁路、开矿，竭力经营。至欧战开始，中国先宣告中立（至1917年8月对德宣战），日本不顾国际公法和中国的中立国立场，悍然出兵攻占胶州，且接管所有德产，并声明以后交还中国，中国政府一再抗议，均归无效。后来，袁世凯醉心复辟帝制，乞援于日本，竟然承认日本提

China

出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就在这二十一条中，也言明欧战结束后交还胶州。但1919年欧战结束，日本却提出要把胶州让与日本，纯属无理要求。陆征祥在和会上严重抗议，并提出一份长篇说帖，说明理由。主持和会的美、法、英、意等国对此均作壁上观，说帖终被搁置。

在和会进行期间，陆征祥随时电报北京徐世昌请示，王正廷、曹霖生随时电报孙中山请示。孙中山指示王正廷：这样丧权辱国的条件，中国无法接受，应强烈抗议。王正廷、曹霖生得到指示后，即说服顾维钧、施肇基。由于曹霖生同顾维钧私交甚深，早年去美国入小学、中学、大学读书，都得到顾的帮助，他的夫人施美珍又是施肇基的侄女，于是顾维钧、施肇基都站到孙中山的一边。他们会同王正廷根据孙中山的指示，促使陆征祥再向和会主席、副主席提出强烈的抗议。

中国驻日本公使章宗祥与陆征祥是老友，当时正在日本谈判山东铁路合同。为使其经手进行的卖国勾当顺利进行，他力图影响陆征祥迁就日本在和会所提的条件，于是回北京，与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密商，拟把顾维钧、王正廷调回，由章任代表，并面见徐世昌，主张照签巴黎和约。徐世昌初步同意，准备电告陆征祥。5月3日，报纸报道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全国人民无比愤慨，5月4日，北京学生到天安门广场集合后游行示威，每人手执小旗，上书“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随之漫卷全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迫使北京政府不得不转变态度。

与此同时，孙中山根据各界人民爱国运动的形势，指示王正廷、曹霖生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王正廷、曹霖生先说服顾维钧、施肇基同意拒签，后来魏宸组也主张拒绝签约，向陆征祥进言不应在这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上签字，以免遗臭万年。

1919年6月28日，中国代表团以陆征祥为首，包括代表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发出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并辞去代表职务的电报给徐世昌，并通电各参战国家，说明拒绝签约的理由。巴黎和约在凡尔赛宫签字时，中国代表拒绝出席。他们给徐世昌的电文是：“和约保留签字，我国对山东问题，自5月26日正式通知大会，依据5月6日祥在会中所宣言维持保留之后，迭向各方竭力进行，迭经电呈在案。此事我国节节退让，最初主张注入约内，不允；改附约后，又不允；改在约外，又不允；改为仅用声明，不用保留字样，又不允，不得已改为临时分函声明，不能因签字而有妨将来提请重议。岂知时直至今午完全被拒。此事于我国领土完全及前途安危关系至钜，祥等所以始终不敢放松者，固欲使此问题留一线生机，亦免使所提他项希望条件生不祥影响。不料大会专断至此，竟不稍顾我国纤微体面，曷胜愤慨。弱国交涉始争终让，几成惯例，此次若再隐忍签字，我国前途将更无外交可言。内省既觉不安，即征诸外人论调，亦群谓中国决无可以轻于签字之理，详审商榷，不得已当时不往签字。当即备函通知会长，声明保留我政府对于德约最后决定之权利等语，姑留余地。窃维祥等猥以菲材，谬膺重任，来欧半载，事与愿违，内疚神明，外惭清议，自此以往利害得失殊难逆睹。要皆征祥等奉职无状，致贻我政府及全国之忧，乞即明令开去祥外交总长、委员长及廷、钧等差缺，一并交付惩戒，并一面迅即另简大员，筹办对于德奥和约补救事宜，不胜待罪之至。”

1919年7月2日，陆征祥又电北京政府：“巴黎和约既未签字，中国德国的战争状态按照国际法可认为继续存在。拟请迅咨国会建议宣告中德战争状态告终，用政府大总统明令发表，

China

愈速愈好。”9 月 15 日，中国宣布对德战争状态终止。

此后，王正廷、曹霖生由法国回到广州，孙中山主持的革命政府在广州大街上搭建牌楼欢迎。王正廷还到上海南洋大学（现交通大学前身）、圣约翰大学等校演讲，介绍巴黎和会上外交斗争的经过，当时我在南洋大学听过他的演讲。

China

巴黎和会期间我国拒签和约运动的见闻

叶景莘

一、外交委员会的产生和结束

北洋政府时期有过三个外交委员会：第一个是巴黎和会将开时于1918年12月中旬成立的，设于徐世昌总统府里。这个会因为反对签凡尔赛和约而于1919年5月3日自行结束。第二个大约是在1923年初黎元洪任张绍曾组阁时设立的，委员长为黄郛，我是委员。但这个委员会并未开过会，我不知会址何在，会的存在时期亦很短。第三个大约是在1925年段祺瑞执政时或较早些时设立的，委员长为汪大燮。他的唯一任务是邀集几个通晓国际法和熟悉条约的委员编一部不平等条约类编，将不平等的条件分类编列，以供修改不平等条约时的参考。这是他的宿愿。类编印出后，会即结束。我未参加这个委员会。

现在我要叙述的是第一个外交委员会的事情。1918年10月徐世昌就任总统，11月11日欧战停止，12月1日外交部总长陆征祥出国赴巴黎和会。他先到日本与日首相商谈，离日上船时就发现丢了一个公事箱。国内舆论本认为陆非外交人才，且为签订《民四条约》者[1]，颇为不满。陆出国后，外交次长陈箓代行部务。他资历甚浅，声望不高，一般人都认为不足以应付局势。于是梁启超、林长民二人向徐世昌建议在总统府设一个外交委员会，任外交元老汪大燮为委员长。徐采纳了，并以孙宝琦、熊希龄、陆宗舆、李盛铎、林长民、王宠惠、沈瑞麟、陈箓为委员，林长民兼事务长，我是管秘书事务的事务员。徐世昌原是个极圆滑的老官僚，他虽被段祺瑞拥上台而自己并无实力，所以要拉拢各党派以增加他的势力。那时他已聘林长民为他的顾问。林劝他请梁启超赴欧洲游历，与各国著名人士联络，为中国游说，徐也采纳了。这个外交委员会设在紫光阁西南角旁边的几间小房子里，虽在总统府内，但与府的办公处隔离较远。除汪、林二人及事务员们每日到会外，委员常来并对会务关心的只有熊希龄一人，王宠惠亦有时来，其他委员来开会时都采取敷衍的态度。当时我天真地以为对和会的政策都是由委员会决定的，专使来电都是由外交部送委员会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重要的来电确是抄送给委员会看的，但未必是全部。

外交委员会成立后，汪、熊二人即联合提出对巴黎和会的提案。共五大纲，首列破除势力范围，分目为收回租借地和铁路附属地、统一管理铁路、撤销外国邮电机关。其他大纲为取消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撤退外国军队、停付庚子赔款。梁启超出国前，亦来会与汪、熊、

---

[1] 1915年1月18日，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5月7日午后3时，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限18小时内答复对二十一条究竟是否承认。9日，外交总长陆征祥奉袁世凯命照会日使馆，对最后通牒要求各节概予承认。25日，陆征祥与日本全权代表日置益签订《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和《关于山东省之条约》，承认日本关于确定在南满与东蒙之权益和继承德国在山东之一切权益的要求。

China

林、王等讨论了这个提案，以便在外接洽。提案经委员会开会讨论审查，于1919年1月6日一致决议通过，由汪、林二人亲呈徐世昌，奉命交院发。次日由林长民亲交代总理钱能训，于8日电致各专使，正在陆征祥抵法之日。18日和会开幕。但以后我们才知道国务院电专使只将这个提案作为希望条件。[1]

另有一事徐却完全接受了委员会的提议：陆征祥赴法途中与广州政府所派代表王正廷相遇，到法后陆即来电报告代表五人及名次，为陆、王、驻美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顾维钧、驻荷公使魏宸组。汪看了这个名次甚为踌躇，因为和会只给中国三个席位，如五人轮流出席，怕有时对于和会情形有不接洽处；如由三人出席，则应为前三人，但陆无甚能力，王亦尚无外交经验，且对和会须南北一致，不知他的主张究竟如何，施则为怕多事的官僚，向不活动。这三人恐不足以应付局势。汪、林相商不决，我建议只好把顾提升到第二位，使他当冲。因为顾来电最多，与美国代表方面的接洽报告都是他这个驻英公使打来的，施并无一电；且二十一条交涉后顾所写的英文声明书颇为得体，他亦熟悉那个交涉的经过。汪采纳了，即将名次照改，与林同去请徐核定，徐同意了。汪、林回会，通知陈箓到会将新名单交他电发。陈拿这个名单出门时，低声说："这是要捣乱了。"果然，新名单到专使处，王、施大哗，陆寡极。他到瑞士去躲避，此事即为一原因。但以后在和会上为中国辩论，确以顾为最力，并最能说。

委员会所提"破除势力范围"大纲里"统一铁路管理"一项引起了大争论。提案原文为：

> 丙、凡以外资外债建造已成未成、或已订合同而尚未开工之各铁路概统一之，其资本及债务合为一总债，以各路为共同抵押品，由中国政府延用外国专门家辅助中国人员经理之，俟中国还清该总债之日为止。各路行政及运输事宜仍须遵守中国法律，概由交通部指挥之。

这个提案的主要目标原是为收回以外资建筑、为势力范围骨干的东清、南满、安奉、胶济、滇越各路。因为国家无此实力，故欲统一管理之，又因无赎回之财力，故欲将其资本及债务合为一总债而以铁路收入还清。但以外债建筑的如津浦、沪杭、京汉等各路亦与势力范围有关，如不包括于统一管理之内一律待遇，既不易得据有以外资建筑各路的各国同意，且恐收入不足以早日偿清总债而亦难于举一总债，因此欲将外资、外债建造各路一概统一之。

外交委员会提案于1月8日电各专使。约一个月后，因中国代表在巴黎要发表包括西原借款合同的中日秘密协定，日使小幡于2月2日到外交部抗议，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登出反对铁路统一的社论。而交通总长曹汝霖声明对于统一铁路案尚待研究，外交委员会委员陆宗舆亦称彼在会本不赞成。先是，称为旧交通系领袖的梁士诒已有反对统一铁路的言论，至是乃与称为新交通系领袖的曹汝霖一齐反对，认为统一即是共管。那时交通部顾问贝克和中英公司经理梅尔思各拟有"万国铁路团"私案，是共管性质，反对者即以此种拟案与外交委员会提案并论。

2月18日钱能训约赞否两方集会于春耦斋。汪、熊声明提案与贝克、梅尔思拟案无关，最后梁亦表示赞成之意。钱声明双方无根本不同之意见，办法应再详议。汪推曹、梁拟案。3月

---

1 据刘彦著《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说，外交委员会所拟提案虽经政府于1月8日致电陆征祥令其照办，然被日本探悉提案有铁路统一案，百计图谋设法由中国人自动取消。不久，果有交通部总长曹汝霖、铁路协会梁士诒等忽然积极反对铁路统一案，后竟由国务院电致陆征祥，令其勿需提出该项。陆征祥等遂依国务院前训令，仅作成我国提出和会之希望条件，并将外交委员会所拟提案中铁路统一一项删除（见该书下卷页169—170）。

China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7日国务院召集春藕斋第二次会议，曹、梁提出破坏原提案的草案，林长民因双方争持不下，拟了一个妥协办法。汪不同意，会后即辞职不复到外交委员会。

平心论之，委员会提案中所举借总债及延用外国专家辅助经理的条件，是因为当时实际情形不能避免，并非共管性质，但以后是否会流于共管，确应考虑。举总债时如何方可不受新银行团的压迫，更是问题。熊希龄以为此等皆系商订条件时所当注意，但政局多变，商订条件者为谁，亦难保证。另一方面，破除势力范围单靠要求，无此实力；但不破除则势将引入瓜分，提案人认为这是最重要的理由。要之，原提案人的用意在破除势力范围，并非为私，他们提出由交通部指挥，而当时他们在交通界并无一个立足之点。梁士诒提出已成外债各路不在统一计划之内，有保持他由于管理和调运铁路收入而来的"财神"头衔之嫌疑。曹汝霖在《顺天时报》反对后出场，陆宗舆在第一次春藕斋会议时，竟为高徐、济顺两路辩护是商业性质而非政治性质，则简直的与日本"一鼻孔出气"了。这是赞否两方主要不同之点。徐、钱则以圆滑手段依违两可于其间，而终偏向亲日派。曹、陆被称为亲日派，汪、熊、林等则被称为亲英美派。

亲英美派是一班无拳无勇的知识分子，在国力太弱时，过分寄望于和会，尤其是对于威尔逊的和平条件14条，以为公理或可战胜强权而欲借他人之力来保持自己的国土，这只可说是可怜。但外交战术本当利用形势和对方间的矛盾。在欧战中，英无力东顾，日本已几乎大嚼"狮子"的一份肥肉，战后美国在海军方面又与英并驾齐驱，纽约还要夺取伦敦的世界金融中心。以势力平衡为传统外交政策的英国，本已利用后来的美国所提出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口号，以保持他所夺取的中国利权，战后他更得以"血浓于水"的甜言，利用日美间的矛盾以联美抗日。所以英美方面对于外交委员会所提破除势力范围一项，曾由两国公使表示赞成。美使芮恩施、英使朱尔典都曾宴请争论铁路统一政策的当事人而于宴后畅谈这个问题，并都声明贝克与梅尔思的私案与使署无关，他们二人亦不能向和会提出。与美使会谈时，汪大燮提出三点：（1）债权国权限只能及于投资确实，本利有着，其他不能过问；（2）执行之权完全归中国政府，他国不得过问；（3）为使资本家安心起见，可设立评议部，以便稽核或建议改良。其中第三点是因为当时铁路收入常被任意挪用亏欠而提出的。林长民曾刊印一本《铁路统一问题》，以披露全案的原委。梁士诒曾表示应当保存势力范围而"赖均势以求存"，他的机关报也发出了这种言论。当时我曾写了一本《撤废势力范围论》小册子送各处以辟之。

汪大燮辞外交委员会委员长，徐世昌屡次慰留，亦不肯问会，以后和会对中国形势日恶，日本原已在1917年2月至3月与英、法、俄、意订立了继承德国在山东所夺取的权利的秘密协定，至是日本代表声明如不照日本提案解决，日本将拒绝签和约，英代表劳合乔治亦宣称日本如不参加国联，英国亦不参加。意大利代表则已因阜姆港问题不遂意而退出。于是威尔逊亦对日本让了步。中国代表团急电纷来，林长民乃亲到汤山慰汪回会视事。

4月30日，英、美、法三巨头决定了凡尔赛和约156、157、158三条，将德在山东所夺取的权利都让与日本，5月1日，陆征祥来电称如不签和约，则对撤废领事裁判权、取消庚子赔款、关税自主及赔偿损失等，将来中德直接交涉，是否较有把握，亦是问题，他怕将来与战败的德国直接交涉失败，因而就主张签字，对日本屈服。这实在是太可笑了，外交委员会紧急会议决定不签约，由汪、林将致专使拒签电稿亲呈徐世昌，徐令国务院拍发。但2日国

China

务院又密电专使签约，院里电报处一个林长民的同乡当晚潜去报告他。3日侵晨，汪、林到会，汪命即刻结束会务，并自草自缮辞呈送徐处而去。我将档案整理了，亲自送交外交部条约司长钱泰接收。林密电梁启超并请他通知巴黎中国留学生，他另又通知国民外交协会嘱发电反对。我回会收拾杂务后，打了一个英文电与上海复旦公学李登辉校长，说“政府主签，我们在此已尽其所能反对，请上海响应”，这个电的署名是随便写了三个英文字母。这个电文曾经登在英文大陆报面页第二行一个方格里，日期不记得了。傍晚我到汪处报告，汪问还有什么办法可想。我说：“北大学生本要游行，何不去告蔡先生。”汪即坐马车从东单二条东口赶到东堂子胡同西口蔡宅，蔡即电召北大学生代表于当晚9点在他家开会商议。北大学生原定于5月7日（即1915年日本发出关于二十一条要求的最后通牒之国耻纪念日）游行，于是决议将日期提早二日，因而就变为五四运动了。

二、国民外交协会的活动

外交委员会成立时，我们早已感觉到政府的亲日倾向，就组织了一个国民外交协会，以备与外交委员会互相呼应。协会在熊希龄宅开成立大会，有会员几十人，以后逐渐增加至百余人，其中有不少各大学学生和几个湖南、贵州等西南省份的代表。协会会所系借用西单石虎胡同私立松坡图书馆西文部。协会成立时，推举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10人为理事；并推干事六人，为：总务陈介、外交叶景莘、文牍寿洙邻、法律王文豹、交际魏斯炅、庶务郑颐钦。以后因警察常去麻烦，郑不能应付，又请英文导报经理梁秋水任秘书。理事常到会的只熊、林、王三人，干事经常办事的只寿、郑、王三人。

5月4日当天，学生被捕32人，各校长和汪、熊、王等都请警厅释放，未允。协会决定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开国民大会。那天清晨，梁秋水从煤渣胡同东口导报馆（今人民日报宿舍）到石虎胡同，路过公园，见园门关闭，门外有武装警察10余人，并架起机关枪。他到会不久，即有武装军警30余人进来，在院中站满。梁问何事，答谓由卫戍司令部警察总厅派来，禁止在公园开会，不遵命即逮捕会员，封闭会所。梁问：“司令部和警察厅是日本机关，还是中国机关？”答谓：“是中国机关。”梁又问：“诸位薪饷是日本的钱，还是中国的钱？”答谓：“是中国的钱。”梁一问：“诸位知道我们为什么今天要去公园开会？”众答：“不知道。”梁告以是为反对签和约，又说：“不料当局反来禁止我们开会，这明明是帮助日本压迫我们。……诸位都是中国人，如果都是好汉，请快快与我们同去公园开会。”众皆无言，梁请他们进厅休息，饷以茶烟。有一个卫戍司令部人员说：“我告诉你真话，会员可不逮捕，会所可不封闭，但公园万不可去，如去一定死人如麻。”梁答谓：“俗语说，‘来者不怕，怕者不来’。”那时会员陆续到了100多人，梁指道：“自来送死的愈来愈多了。”双方相持许久，那个卫戍司令部人员请梁想个办法。梁沉吟些时说：“如要我们今天不去公园开会，今天必须先把被捕的学生释放。”那人打了多次电话，最后说，“长官同意梁先生的办法”，但问谁负责。梁说：“我姓梁的负完全责任。”于是军警散后，会员们整队向天安门进行，在新华门前与被释放的学生相遇，大家一齐转向前门，沿路高呼“反对巴黎和约”，散发传单，熊、林二人亦赶到了。会员们一部分到商会开会，一部分到先农坛去开会，下午四五点钟回

China

石虎胡同而散。

5月8日，北洋政府又颁布弹压学生命令。6月3日北京学生讲演，被捕的为数更多。但各地民众已相继起来，罢课罢市，抵制日货，遍及全国，北洋政府被迫罢免曹、陆、章等。6月10日，徐世昌咨两院辞职，但仍通电各省主张签约。6月23日，国务院电各专使签约。28日签约之日，巴黎中国留学生包围了代表团寓所，周鲠生先生也是前往者之一。本来各专使并非无爱国思想，更非亲日派，未必愿签约。陆征祥实是个好好先生，我们常批评他不过是个“大礼官的材料”。他也许会迫于政府命令去签，如袁世凯命他签《民四条约》一样，但亦不能与曹、陆一概而论。其他专使都是精明机警之人，即使专为个人着想，亦未必肯负这个签约的责任，来蹈曹、章的覆辙。当时各处电专使拒签的电文有极严厉的。那时陆原是欧美同学会会长，蔡元培是总干事，王宠惠和我是副总干事，我们于3日以三人名义电陆勿签。我起的电稿最末说“如签，回国不利”，蔡以为不应恫吓他而删去了。但国民外交协会连去三电，第三电仓文为“公果敢签者，请公不必生还”。此外各处去电必有更激烈的，专使们敢犯众怒吗？专使寓所既被包围，于是不去凡尔赛签约而对巴黎各报发表了一个正式声明，历述中国代表团的苦心：如4月4日对和会的抗议，5月6日关于山东条文保留的提议，5月26日在保留条件下签约的正式通知，并举出1815年6月9日维也纳条约签字时瑞典代表保留三个条文而签约的前例，以驳斥保留无前例之说；以后中国代表又提出将保留条件作为和约附件，不被接受；又提出在赴凡尔赛签约前送一保留山东条文的声明，而和会主席只允在签字后送去；代表团以签字后的声明效力可疑，又提出修改声明字句，亦不被接受。因此，声明最后说，中国代表团为正义、为国家，只有不签约，以待世界舆论之裁判。[1] 这个声明是否预先拟好的，不得而知。

拒签凡尔赛和约，是全国人民，包括群众、学生、知识分子和一部分统治者或曾充过统治者的一些人的爱国思想和力量联合起来所造成的结果。

---

[1] 见麦克莫雷：《与中国订立的和有关中国的条约协定汇编》，1495页。

回忆五四运动

许德珩

（一）五四运动预备时期

五四运动的远因

五四运动是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发生，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孕育起来的。五四运动的最大特点，就是中国人民革命从此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同盟军，不再是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同盟军，这就是说中国革命的性质从此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五四运动虽然发生于1919年5月，但究其远因，却要追溯到五四以前的中国社会情况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先谈当时中国社会的情况。1916年6月，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死了。袁死后，因反袁而流亡在国外的各方面人士纷纷归国，国内政治、思想、教育界的一潭死水由此动荡起来。可是一个袁世凯虽死，而众多的“袁世凯”出来了，中华民国依然如旧，武装还是军阀的武装，政权还是军阀的政权，并由此还引起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封建余孽辫子兵张勋还曾在1917年7月，挟清朝废帝溥仪宣告复辟，虽然不久即被消灭，但国脉又多受了一次摧残。孙中山先生想在黑暗中打开一个局面，曾于1917年8月下旬召集国会非常会议于广州。孙中山本人被选为大元帅，组织护法军政府，形成南北对峙局面。终因缺乏正确的革命方针，以致南方也发生了分裂，从人民所遭受的痛苦来说，南北完全一样。孙中山先生也只好在1918年5月去职赴沪，开始写他的《孙文学说》去了。

此时，日本帝国主义趁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欧美各国无暇东顾的时候，独自侵略中国，曾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条约，以此作为交易，帮助袁世凯做皇帝。袁贼称帝心切，二十一条亡国条约，除其中的第五款以后商量外，其余均接受了。袁世凯死后，张勋复辟，北洋军阀段祺瑞打败了张勋。为了攫取中国政权，段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继续承认了二十一条，获得了日本的大借款。日本帝国主义参加了欧战，站在协约国一边；我国也参了战，也是站在协约国一边。日本借口德国为敌对国（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同盟国，日本和我国都是协约国，协约国与同盟国为敌对国），自行出兵我山东，将辛丑条约中规定的德国在我山东的权益，据为己有。事为我留日学生所知，极端反对，1918年5月7日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开会，抗议中日秘密协定，被日本警察拘捕多人。全体留日学生对日抗议，罢课回国。

China

学生爱国运动力量的兴起

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倍受压迫，在为国家生存而斗争的历史过程中，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经常站在斗争的前列，起着先锋和桥梁作用。中华民族又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在革命力量的推动下，国内外学生都不能安心求学，于是他们行动起来了。这次学生运动的主力在北京大学，因此我们有必要先介绍一下五四以前的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创建于1898年戊戌变法之际，前清称京师大学堂，是中国一所最老的大学，到五四运动时已经有21年的历史了。它有文、法、理、工、商五科和预科，学生约一千八九百人。1916年以前，校风很腐败，学生年纪大的相当多，做了举人秀才的学生也还有，校内工友称呼他们是“老爷”，以后也称他们为“先生”。学生宿舍只有马神庙西斋、沙滩东斋和北河沿八旗先贤祠（以后为译学馆，最后改为北大预科）三处，大部分学生在外面寄宿，住公寓。学生不穿制服，也没有制服，一般是长袍马褂，时髦一点的穿长衫和西服裤。整个学校没有图书馆，只是马神庙理科有一座古老的藏书楼。学生中除少数死读书之外，打麻将、捧戏子、逛八大胡同，成为风气。当时北京社会上有“两院一堂”之称，“两院”就是参议院、众议院，“一堂”就是京师大学堂。生活自由散漫，谁也不管谁，偶一发生问题，就写出像今天大字报一样的揭帖贴出来，赞成的、反对的，你唱我和，花花绿绿，贴满墙壁。这是当时北大的一般情况。

蔡元培的“兼容并包”

1916年冬[1]，蔡元培来到北大。蔡是清末的一位翰林，辛亥革命时，参加过孙中山先生的南京临时政府，做教育总长，国民党反袁失败后流亡海外，袁死后回国。蔡到校不久，宣布他的办学宗旨是“兼容并包”，提倡“学术思想自由”，等等，这在当时发生过一些进步作用。他所谓“兼容并包”，并不是新旧一揽子全包，而主要是罗致具有先进思想的新派人物，对那些腐败守旧人物则尽量排除。由于他的“兼容并包”，北大在他来以后，就包括了几种类型的人物：

第一是《新青年》方面的人物，即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1917年初，蔡元培聘请了陈独秀来做北大的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也聘请了鲁迅、钱玄同、王星拱、刘半农、徐宝璜以及以后的李四光、顾兆光等这些当时所谓“新人”来校任教，还扩建藏书楼为图书馆，聘请了章士钊做图书馆馆长。章不久即辞职，推副馆长李大钊代替。李大钊是日本留学生，1914年章士钊在日本办反袁的《甲寅杂志》（即“老虎报”），李大钊和陈独秀都经常在《甲寅》上面写文章。陈独秀以后又在上海办《青年杂志》，到北大不久，就把《青年杂志》改名《新青年》，主张白话作文，鼓吹文学革命。李大钊、鲁迅当时经常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大概在1917年秋，胡适由美国回来，到北大任教。《新青年》里面一方面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文章，同时也有胡适、王星拱、刘半农、周作人诸人之稿。他们虽然都是在《新青

---

[1] 1916年12月26日黎元洪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次年1月4日蔡到任。

年》里面的新文化运动人物，可是从政治见解上彼此却有着很大的分歧。

陈独秀尽管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但其实质依然没有超出文学改良的范围。虽然这种文学改良运动，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有它一定限度的进步意义，尤其白话作文方面。可是这种文学改良运动，如果离开了政治思想上的民主方向，如果没有人民群众做基础，那就决不会有什么真正的革命意义。这种现象只有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也只有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先驱者李大钊，在1918年10月所出版的《新青年》五卷五号上面，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卓越的文章之后，才引起本质上的变化，才真正开辟出一条中国新民主启蒙运动的康庄大道。不过，当时社会上介绍这一方面的材料还不够多，报纸上报道的也不翔实，反动派常把“布尔什维克”译成“过激派”。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8年11月），协约国胜利了，德国失败了，中国因为参加了协约国，有些人竟然把自己也看成是什么“胜利国”，一时“公理战胜强权”的口号高唱入云。受美英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如胡适等人，大肆宣扬美国的“民主”，美国总统威尔逊骗人的“和平十四条”，被宣扬成“民主的象征”。留美归国的杜威的学生蒋梦麟曾把它翻译出来。北大学生傅斯年为讨好胡适，自夸说可以把“和平十四条”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

胡适与李大钊在政治立场、观点上就有很多冲突，如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胡适就讲民主主义战胜军国主义；李大钊讲马克思主义，胡适就讲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同时他自己又宣扬杜威的实用主义。李大钊站在学生一边，参与学生运动；胡适则站得远远的，并主张20年不谈政治。过去曾有过“胡适领导五四运动”的荒谬说法。必须指出，当五四运动发动时，胡适因母丧回安徽原籍，不在北京，根本没有参加五四运动，更谈不到什么“领导五四运动”。可是五四运动的怒潮，却真是把胡适吓倒了。当胡适由家里回到北京的时候，北大和其他各校学生还正在罢课，胡适曾出面劝说学生复课，结果被学生严正地拒绝了。胡适想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提议把北大迁到上海，发动师生有愿去者签名，追随胡适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都签了名。马叙伦、刘文典对此大不以为然，刘还把傅、罗签名的事告诉了陈独秀。陈把傅、罗叫去训了一顿。胡适的如意妙算没有成功。这时胡适还想方设法用蔡元培、陈独秀的名气来抬高自己。他说北大是由三个兔子而成名的，一个老兔子是蔡元培（蔡生于清同治六年丁卯，按十二属相，卯是属兔的），一个中兔子陈独秀（陈生于清光绪五年己卯，也是属兔的），一个小兔子即胡适自己（胡生于清光绪十七年辛卯，也是属兔的）。一时传为笑谈。在胡适影响之下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俞平伯、徐彦之、毛子水等，办了一个《新潮》杂志，后来参加的还有汪敬熙等。《新潮》杂志在出版时自吹自擂，刊登广告自称是“北京大学之新潮”。由于胡适的关系，北京大学每月出大洋400元作为《新潮》的津贴费用。这个刊物主张白话作文，偏重于文字改革运动，虽然在当时历史条件之下，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对于反侵略、反卖国的运动却起了不少的反作用。

第二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在北大也很活跃。蔡元培校长到校后，聘请了前清大学士李鸿藻的儿子李石曾（煜瀚）来北大教生物学，聘请了吴稚晖（敬恒）当学监。李石曾只来了很短的时间，吴稚晖来到学校尚未正式就职，无政府主义思想就由他们传播到了北大。李、吴这帮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巴黎开豆腐店，办了一个刊物叫《旅欧周刊》，褚民谊做编辑（以后当汉奸），经常介绍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的思想，鼓吹无政府主义。同时也有人翻译了克鲁泡特金、蒲鲁东的著作。蔡元培本人当时也有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这

China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